

任宜敏

著

中國
佛
教
史

元代

人民出版社

中國
佛
教
史

卷一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
佛教史

元代

任宣敏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郇中建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史 元代/任宜敏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01-004944-0

I. 中… II. 任… III. 佛教史-中国-元代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308 号

中国佛教史 元代

ZHONGGUO FOJIAOSHI YUANDAI

任宜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5

字数:332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4944-0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任宜敏，1957年10月生于浙江奉化。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年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学刊》杂志社常务副主编、浙江财经学院教授。

曾以本名及“连叔”、“秦失”、“一愚”等笔名出版过《批判与重建——科学成长的奥秘》、《世界现代（前期）哲学思想史》、《京畿莲邦》等哲学、宗教类专著及相关译著七部，发表过《佛家因果学说的真精神》、《避世厌世，还是入世益世？》、《消极的，抑或积极的？》、《慧忠国师禅要析论》、《弘悟普度，名冠元世》、《略论信仰自由与宗教立法》、《普应国师禅学思想析论》等论文数十篇。

目 录

(1) 第一章 导论

- (1) 一、宗教政策
- (10) 二、僧官制度
- (17) 三、刻经与著述
- (31) 四、造像艺术
- (41) 五、寺院经济

(48) 第二章 藏传佛教·后弘诸派

- (50) 一、西藏佛教的复兴
- (53) 二、宁玛派
- (61) 三、噶当派
- (77) 四、萨迦派
- (105) 五、噶举派
- (155) 六、希解派



(163) 七、觉域派

(165) 八、觉囊派

(170) 九、霞鲁派

(175) 第三章 藏传佛教·宸极光隆

(175) 一、萨迦派的特殊地位

(197) 二、其他各派与蒙元皇室的关系

(204) 三、藏传佛教的特色

(209) 第四章 禅宗的演化

(209) 一、临济宗的展开

(290) 二、曹洞宗诸尊宿的化迹

(300) 第五章 台贤慈律诸宗

- (300) 一、天台宗
- (314) 二、贤首宗
- (326) 三、慈恩宗
- (329) 四、律宗

(332) 第六章 白云宗、白莲宗的 兴衰

- (332) 一、白云宗
- (340) 二、白莲宗
- (355) 三、白莲宗与白莲教的区别

(367) 第七章 以佛教文化为桥梁 和纽带的国际交往

- (371) 一、中国佛教文化对日本列

岛的影响

(406) 二、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佛教
文化交往

(416) 三、中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往

(422) 元代佛教大事年表

(453)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导 论

元代佛教,主要指元世祖忽必烈登基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退出大都这百余年间佛教在全国范围传播发展的史实。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某些宗派发达变迁的脉络,有时亦上溯或兼及大蒙古汗国立国前后之法灯慧炬。

一、宗 教 政 策

西元 1206 年冬,蒙古各部族大会于斡难河之源,公推铁木真为“成吉思可汗”(著名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指出:“汗”是“王”,“可汗”是“皇帝”;成吉思是“可汗”而不是“汗”。一般书籍中所称的“成吉思汗”,乃是“习非成是”^①。此后几十年,成吉思、窝阔台、蒙哥、忽必烈数代可汗,率领不足十三万人的蒙古铁骑,东征西讨,

^① 参阅黎东方:《细说元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0 页。

横扫欧亚大陆,相继灭西辽,平西夏,受畏兀儿、斡亦剌惕诸部之降,囊括花刺子模、金、大理、南宋故地,并大败钦察、斡罗斯、波兰、匈牙利,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袤的世界性大帝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①

◎ 在这个疆域远超汉唐的庞大帝国内,杂居着众多的民族,除汉、蒙、藏外,人口较多的还有回回、畏兀儿、女真、契丹、阿儿浑、哈刺鲁、康里、钦察、阿速、斡罗斯等三十多个民族^②。每个民族又都有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

元代以前,我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专制君主以暴力手段打击、取缔外来宗教的事件。例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等,都曾动用国家机器毁寺杀僧,严厉镇压佛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外来宗教。

蒙古族虽然信仰萨满教,成吉思、窝阔台、蒙哥诸位可汗亦都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们从未因某种宗教是外来的或与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不一致而加以歧视、排斥,相反,他们始终都以积极开放、大气包容的心态对待各民族的各种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任何其他的正统宗教,都包含有劝

①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

② 参阅[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

人安分守己、修身养性的教义,都具有排忧解难抚慰心灵、稳定社会辅政教化的功能。因此,他们以前无古人的恢宏气魄,对各民族的各种宗教信仰,均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政策,允许一切人等享有选择和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权利,并为此积极身体力行。结果,甚至连皇室成员的宗教信仰也呈缤纷多彩之态:元太祖成吉思、太宗窝阔台、宪宗蒙哥三位可汗信萨满教,定宗贵由可汗和成吉思可汗次子察合台信基督教,成吉思可汗之孙别儿哥信伊斯兰教,另一孙子、元世祖忽必烈信奉佛教,太宗后脱列哥那、睿宗后唆鲁禾帖尼信基督教,世祖后察必信佛教,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之孙)及所部十余万人信伊斯兰教,如此等等。可以说,宗教信仰自由,从大蒙古汗国草创之日起,即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定制甚至国策。

蒙古太祖六年(1211年),信奉景教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软禁西辽皇帝直鲁古,大肆屠杀无辜平民,甚至把和田的回教首领阿赖乌德丁·穆罕默德钉死在清真寺的大门上^①。其胡作非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成吉思可汗乘机遣大将哲别征西辽;破城之日,即“宣布信教自由”。为了保持这一政策的连续性,他还严令诸皇子:“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②

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可汗于率兵征讨花剌子模前夕,下诏特派近侍官札八儿、刘仲禄等二十余人寻访并邀请道教全真教派领袖、“七大真人”之一的丘处机,向其请教治国方略和养生之道。丘处机不远万里来谒后,被奉为上宾,备受优礼。面对剽悍暴戾、杀人如麻的“一代天骄”,丘处机力劝其“当外修阴德,

① 参阅黎东方:《细说元朝》,第41、69—70页。

② 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62年,第81、158页。

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①“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以敬天爱民为本”,“以清心寡欲为要。”②对丘处机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成吉思可汗非常赏识,故尊称其为“神仙”,从不直呼其名;而对其面授的修身、治国之道,成吉思可汗亦很感兴趣。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记载,“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元史·释老传》亦道:“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爵“大宗师”,赐金虎牌,令其总领天下道教。丘处机回燕京后,成吉思可汗又遣使劳问:“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③

太祖十八年(1223年),成吉思可汗下诏蠲免全真教团的差役赋税:

成吉思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

丘神仙应有底修行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丘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赋税者。其外诈推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案主者。

奉到如此。不得违错。须至给照用者。

右付神仙门下收执。

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底人等并免差发赋税。准此。

癸未羊儿年三月日。④

①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②③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④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由此开启元世蠲免各宗教团体赋税差役之端绪。

虽然道教后来在与佛教的辩论中失败,但蒙元朝廷并未因此予以排斥、取缔,而是仍以宽容的态度善待道教各派。例如,对源于东汉张道陵的道教“正一教”派,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召见其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衣,令其主领江南道教,并赐银印。同时,留其徒张留孙随侍阙下,授“玄教宗师”号,赐银印。成宗继位,加号张留孙为“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武宗立,“升‘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仁宗时,又进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玉为玄教大宗师印以赐。”^①其他如“真大道教”、“太一教”诸派,朝廷也都一一召见其首领,加封道号,赏赐优厚。即使是直接与佛教发生冲突的道教“全真教”派,在受到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的处分后,虽然政治地位大大跌落,但仍可以自由传教。两度出任中书右丞相的安童,曾多次向丘处机的四传弟子祁志诚问道,受其影响非常之大;忽必烈知道后,亦止“叹异者久之”而已^②。元末,全真教南北两系正式合并,发展再盛。

在与全真教领袖交往的同时,成吉思汗也很留意中原汉地的佛教禅宗僧人,其中特别推崇临济宗大德中观沼公及其弟子海云印简禅师的学识和教证功德,专门传旨给木华黎,一定要厚待他们:“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行者。”^③此后历代可汗,都对海云印简禅师优礼有加:贵由即可汗位后,诏命海云印简禅师统天下僧众,赐白

①②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③ [元]梅屋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

金万两,并延请其到蒙古汗廷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主持太平兴国禅寺;宪宗蒙哥继位后,再次颁诏,命海云印简禅师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世祖忽必烈尚在潜邸时便专程把海云印简禅师接到军营,请问佛法大意及安天下之法,从其受菩提心戒,对其数次开示均一一顿首受教。海云印简禅师的再传弟子刘秉忠,更是忽必烈身边一位最重要的佐命之臣。此外,曹洞宗硕德万松行秀和尚的弟子耶律楚材,也备受成吉思、窝阔台诸位可汗之信赖倚重,并因赞襄治国安民之道而成为大蒙古汗国初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总之,自成吉思可汗以下,历代大蒙古汗国的君主对汉传佛教及其僧团都奉行优礼的政策,“太祖则明诏首班。太宗则试经、造寺、雕补藏经。谷与(即贵由)皇帝则令僧扈从,恒诵佛经。蒙哥皇帝则供僧书经,高营宝塔。”^①

自世祖忽必烈始,藏传佛教受到空前尊崇。历代元帝在登基前都必须先受帝师的灌顶、授戒,因此可以说都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之弟子。但是,无论藏传佛教抑或汉传佛教,都是佛教;而且,元代很多官员、特别是负责处理佛教事务的官员的行事作略表明,他们的佛学造诣相当之高,见地也非常纯正。故终元之世,汉传佛教都不曾因朝廷尊崇藏传佛教而遭排挤、受压制,相反,其地位远远高于两宋时期。世祖忽必烈不仅于“万机之暇,自奉施食,持数珠而课诵”^②,而且在各地广建寺院,大做佛事,蠲免寺院田产诸税,俾僧伽能安心办道。忽必烈以下诸帝,亦多依其范例对待汉传佛教,有的信之益笃、崇之弥甚,诸如营建大寺院、大规模赐田赐钞的崇佛事件,屡朝不绝。是故,元人危素言:“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

① [元]祥迈:《至元辩伪录》卷四,见《大正藏》第五十二册。

② [元]梅屋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崇护卫,莫盛于本朝。”^①

不过,蒙元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有时颇溢出常规。例如,成宗铁穆耳曾赐给西藏僧人《优礼僧人诏书》: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中书省官人每根底,枢密院官人、御史台官人、行中书省、行御史院官人每根底,廉访司官、守城官、地方官每根底,军官、军人、大小头人、众多部落,成吉思皇帝和窝阔台皇帝定制,依照释迦牟尼之教法诸班第每皆不纳三种差,告天祝祷,为皇帝祈福。忽必烈皇帝信奉三宝,使释迦牟尼教法遍布人世间,使僧众皆为皇帝祈福祝祷。虽如此反复下诏,仍有守城官员和部落头人不晓其意,依势侵夺寺庙和佛殿,欺凌僧人。从今以后,管领部落之官员和百姓们,应遵释迦牟尼教法,再不得欺凌僧人,不得践踏寺庙和寺院,当心侍奉着。为侍奉西番之僧人,忽必烈皇帝在位时,军犯营中有一名马明之人,因拉执僧人衣领,受到重罚。今后,如有俗人以手犯西僧者,断其手;以言语犯西僧者,割其舌。自颁发此诏书之后,对不敬奉僧人和践踏寺庙和寺院的人,请派遣到各地的官员和僧人长者联名奏来,朕知后必加惩处。此诏书于鸡年阴历三月二十八日上都有时分写来。^②

武宗海山继位后,又通过宣政院将此诏书的核心内容晓谕全国:“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③时居东宫的“皇太

① [元]危素:《危太朴文集》卷五《扬州正胜寺记》。

②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130页。

③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后为仁宗)闻讯亟奏谏止,才得以寝息此令。

又如,历代元帝对帝师之礼敬尊信,无所不用其至。爱屋及乌,导致其族人、弟子辈中有“司空”、“司徒”、“国公”之号或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①

再如,朝廷为应对边防警报之虞,特别制有“金字圆符”;对它的佩带使用,有严格的规定:“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若滥给者,从台宪官纠察之。”^②但是,根据泰定二年(1325年)西台御史李昌所奏,许多西番僧似乎可以任意佩带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骚扰驿户;各级官吏却不敢以律相绳。

◎ 朝廷对藏传佛教异乎寻常的荣宠,固然使得藏传佛教发展的整体环境和僧伽办道的外部条件大大提升,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事与愿违的结果:某些本来就未具正知正见、实际践履的功程又极肤浅的西番僧,不仅没有利用外部的优越条件去通达佛教义理,刻苦进修,证悟空性,反而走上了贪图享乐、谋求官职、追逐利禄之歧途,甚至不惜为此残害平民,殴打命官,纵恣跋扈,横行不法,“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③

不过,元代佛教,虽无渭滨务逍遥之集、庐岳结般若之台以及禅开五叶、教创台贤之巍巍气象,但决不乏岩栖谷隐晦迹深修之行者,尽除惑障遍入毗卢之硕德,学贯三教振玄发微之俊杰,慈忍普济妙用纵横之导师。其遗芳余润,时至今日,仍令人心醉自失。

①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② 《元史》卷一百三《刑法志二》。

③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